



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

孙弘安 主编



013030475

K269.407
03

孙弘安 主编

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



南京大学出版社



K269.407
03



北航

C16356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 / 孙弘安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305 - 11259 - 1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中央苏区—历史—研究
IV. ①K269.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63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
主 编 孙弘安
责任编辑 李鸿敏 胡 豪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74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1259 - 1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讲 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
第一节 千古未有之变局	(1)
第二节 振兴中华的呼唤	(3)
第三节 救国方案的多元展开	(7)
第二讲 中央苏区革命的兴起	(16)
第一节 由“告别革命论”说起	(16)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乡村渗透的失败	(18)
第三节 制度移植与中国现实呼唤的产物	(22)
第四节 中央苏区的符号象征	(25)
第三讲 中央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30)
第一节 战略重点的转移	(30)
第二节 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35)
第三节 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41)
第四讲 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	(46)
第一节 早期的红色政权	(46)
第二节 苏区政权建设的发展	(48)
第三节 苏区政权的民主建设	(54)
第五讲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建设	(60)
第一节 强调思想建设	(60)
第二节 完善组织建设	(64)
第三节 三大作风建设	(68)
第四节 宝贵的经验：党的建设的历史遗产	(71)
第六讲 中央苏区革命教育事业的展开	(75)
第一节 新型教育体制的确立	(75)

第二节 学校教育的推进	(79)
第三节 社会教育的普及	(84)
第七讲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与反腐倡廉	(91)
第一节 革命法律体制的创立	(91)
第二节 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	(96)
第三节 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运作	(102)
第八讲 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	(109)
第一节 土地革命的开展	(109)
第二节 指导思想的转变	(117)
第三节 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	(118)
第九讲 中央苏区的文化事业	(131)
第一节 红色文化的兴起	(131)
第二节 教育和宣传	(133)
第三节 文艺活动	(135)
第四节 新闻出版业	(141)
第十讲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147)
第一节 武装力量的发展	(147)
第二节 中央苏区的军事动员	(153)
第三节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156)
第十一讲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	(161)
第一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	(161)
第二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163)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类型与途径	(167)
第十二讲 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	(17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大本营	(17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地	(17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一次探索	(179)
第四节 苏区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80)
后记	(185)

第一讲 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千古未有之变局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①因此,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得十分缓慢。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形成了以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一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7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在康熙至乾隆时期,产生了与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可以媲美的“康乾盛世”。但是到了19世纪前半叶嘉庆和道光两朝,即鸦片战争前夕,其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

首先,政治上腐败、黑暗。突出的表现是官场中贪污成风,贿赂公行。1799年,乾隆时备受恩宠的军机大臣和珅被抄家时,查出所藏黄金3.2万两,地窖银300万两,还有无数珍宝,全部家产约8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近20年的国库收入。所以时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于一般州官县令,多到任贪赃枉法,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当时流传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其次,经济上贫富悬殊,民生凋敝。这集中表现为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道光时,直隶沧州一个袁姓地主占地2000顷,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占有土地约256万亩。土地集中于贵族、官僚、地主手中的过程,也就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的过程。

再次,军事上军备废弛,军队瘫痪。清军不算临时招募的乡勇,仅八旗、绿营两种正规军,总计在八九十万人,每年耗饷银2000万两以上,而在鸦片战争前已腐败不堪。士兵很少操练、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酗酒狎妓。

最后,思想文化领域沉闷僵死。清朝统治者一面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规定以朱熹所注儒学典籍为考试标准,大力提倡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力图将人们的思想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施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严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24页。

压制进步思想,以禁锢人民的反抗意识。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英国在17世纪中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革命大体完成。1840年,英国工业产量已占世界工业总量的45%,英国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经过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1830年法国工业生产应用蒸汽机650台,1839年增至2450台;1815—1840年,棉织品产量增加了三倍。

美国资产阶级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建立政权,但直到19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美国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却很快,农业机器的生产数量迅速超过了欧洲各国。到1850年,美国铁路总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首位。

俄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东欧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经济远比西欧国家落后。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俄国的资本主义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由此可见,工业化浪潮之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开。而随着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必将随后而来。

随着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25年,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为了摆脱危机,增加利润,对外更加疯狂地掠夺殖民地。1840年,英国就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

法国商人对中国也早已垂涎欲滴。1660年,法国成立了中国公司。1688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张诚、白晋、洪若翰、李明、刘应等5名传教士到达北京。1698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到中国,随船又来了一批传教士。当时法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对外贸易很难同英国竞争,因此往往以天主教作为主要侵略工具。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法国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法国虽然在争夺殖民地方面与英国矛盾重重,但在掠夺中国方面却与英国狼狈为奸,企图从中渔利,捞取更大的实惠。

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向北美洲西部大陆扩张,到19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太平洋沿岸,领土面积从原来的约230万平方公里扩张至约777万平方公里。美国还依靠海盗式的冒险开展对华贸易,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它的经济实力虽然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却积极充当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趁火打劫。

沙皇俄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越过乌拉尔山,占领西伯利亚,随后侵入黑龙江流域的雅克萨,遭清军打击后,于1689年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1727年又订立《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此后,沙俄又侵入中亚地区,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新疆地区。

1840年,鸦片战争的连天炮火惊破了古老中国的封建残梦,使其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此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这个昔日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疆

土日削,主权日丧,地位一落千丈。而其维系数千年之久的封建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在西方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大潮的冲击下,无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在这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衰变。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大大动摇了其旧有的根基,挟着坚船利炮东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猛烈的冲撞,后者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中第一次处于明显的劣势,终于在这场“古今中西”的文化大交锋中衰疲不支而节节败下阵来。

在这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各个阶层、无数志士仁人都对中国的未来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二节 振兴中华的呼唤

一、农民的理想天国

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这场运动,建立了农民政权,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带有时代赋予它的新内容和新意义。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和错误领导,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这场运动,没有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但它削弱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一) 太平天国的兴衰

金田起义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最早的信徒有冯云山和洪仁玕。1851年,当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十分顺利、拜上帝教势力获得很大发展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开始准备起义。起义爆发后,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不久,洪秀全称天王,在广西永安建立政权、颁行制度、分封诸王。1852年春,太平军挥师北上,经湖南打到湖北,攻克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于1853年3月攻克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控制了安徽、江西、湖北、江苏的大片土地。

天京变乱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领导集团的进取心逐渐减退。他们大兴土木,严格等级秩序,越来越脱离群众,领导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杨秀清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进京——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家属和部下共两万多人——石达开进京责备韦昌辉杀人过多——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离天京,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在京家属——韦昌辉围天王府——太平天国军民处死韦昌辉——石达开回朝主事。天京事变的发生,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领导集团的分裂和互相残杀,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威信,领导力量大为减弱。天京事变中,许多当年参加金田起义的“老兄弟”被杀,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不相信外人,提拔了他的两个哥哥为王,以牵制主持朝政的石达开。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从而使太平天国革命力量分裂,这是天京事变最严重的后果。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全盛时期结束,由此转入艰难的防御阶段。

(二)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性文件。其内容主要规定了分配土地的办法

和其他改革措施。其中关于土地分配,《制度》规定:不论男女,只要年龄达到16岁,均可分到一份土地。目的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实质上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平均分配的强烈愿望。但这种绝对平均分配的办法,只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资政新篇》的作者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主要内容是改革内政、建设国家,如兴办近代工业、鼓励开发矿产、开办银行报馆、奖励私人发明等。这部书提出了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反映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不是农民自发愿望的反映,加上太平天国内部的动荡,因此也没有得到实践。

二、维新志士的追求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希望在保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独立富强,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非常缓慢,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而封建势力相当强大而顽固,因此,从1898年6月到9月,前后仅100多天,戊戌维新运动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了。但是,这次运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公车上书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各省参加考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同日本议和,请求变法。由于汉朝时政府用公家马车接送应试的举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二字作为举人入京考试的代称,所以这次上书被称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由于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开始转化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他再次上书,痛陈变法的重要,光绪帝深受震动,决心变法,康有为被授权参与变法。听到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陈遭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人民“揭竿斩木”的可忧境地,请求从速变法。康有为的言词使光绪帝深受震动,他表示决“不甘作亡国之君”,并且下令要康有为等筹划变法。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制定章程,倡议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呼吁救国,宣传变法。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实行变法。1898年是旧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帝还让维新派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参与变法。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有:

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

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官,澄清吏治。

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变法法令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因此,戊戌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也得到一部分爱国人士的支持。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改革现状,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这是爱国和进步的行动。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反对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变法遭到了顽固派的竭力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和直隶总督荣禄等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慈禧太后宣布“亲政”,废除变法,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经过103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是躁动于母腹中的一个快要成熟的婴儿,那么,甲午战争的失败和瓜分狂潮的威逼,就是它的催生婆。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中国一样闭关锁国,遭受着外国的侵略,但是经过变法维新,励精图治,日本国力大盛,在甲午海战中,一举摧毁了北洋海军,迫使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彻底粉碎了洋务派的“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①的美梦。邻国日本的强盛,既给了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一些警醒,也给了他们一个成功的范例。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在继续探索与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三、清末新政的尝试

清末新政,是晚清王朝挽救自身统治的一次尝试。其大致的历程如下:

1901年4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1905年9月,派遣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5人出使西洋,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咨询。1908年8月,颁发《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同年,慈禧与光绪逝世,溥仪继位,次年改元宣统,重申立宪。辛亥之前,清政府施行的新政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筹措军饷,训练新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二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三是废除科举,育才兴学。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了。四是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改设外务部”,等等。

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民元之前影响最大的一场由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封建愚昧的面貌。新政中废除科举制,各省广泛创办了大中小学校、图书馆,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思想理念传播到了更多的士绅官僚之中,从而推进了立宪运动;政治上进行了新官制改革,相比之前大大加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为后来建立责任内阁制打下了基础。《钦定宪法大纲》的颁行,商业立国、农村自治的施行,中央咨政院、各省谘议局的设立,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

四、孙中山与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

首先是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主张。他们不满意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某些积弊现象,要求励精图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夷的目的。

其次是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总理朝政时颁布的《资政新篇》,提出了革新政治,革除陋俗,仿效西方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中外交流等一系列主张。这一纲领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的方案,尽管它还很原始,却是当时超出了农民小生产者眼界的一种最新颖的方案。

最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他们把反清革命斗争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系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中心的三民主义纲领。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又系统地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总之,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重要里程碑,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内提出的各种救国方案中最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方案。它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民生富裕的意愿,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旗帜。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及其失败

自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将其作为最新的救国方案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及新兴的知识阶层)为实现这一方案而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斗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辛亥革命取得的最大政治成就是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三个象征——国会、总统、宪法,当时都已基本具备(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接近成功的机会,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很快就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势力所控制。

（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纵观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经过多次奋斗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别国有过,中国不能有。”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来考察。当

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为实现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努力奋斗之时,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从中国国情的特点来分析。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外无独立。

中国革命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不但提出了而且坚决执行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真正解决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团结。在这种条件下,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在建国方案的选择上自然地投向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他们没有也绝不可能再去选择一种新的剥削制度的枷锁来套在自身的脖子上。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必然,可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失败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情所决定的。

第三节 救国方案的多元展开

一、军阀政治与民族危机

袁世凯是靠北洋军起家的,然而北洋军并不是一个坚固的军事集团。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势,中国也由此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从1916年至1928年张作霖政府败亡为止,先后由皖系、直系、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从政体形式上看,1916年6月至1924年10月,基本维持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体制,然而在军阀的操纵之下,民主共和的形式还在,民主共和的精神已荡然无存。

首先国会、制宪成为军阀装饰门面的工具。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后,黎元洪就任总统,恢复约法,并于1916年8月1日重新召开国会,称国会第二期常会。这次会议召集后,确立了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内阁,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这届国会与内阁对抗,支持黎元洪、反对参战,段祺瑞用武力相迫,指使皖系军人围攻国会。而后来的曹锟则以5000元一票或更高的价格贿选,终得480张选票,被贿赂的议员于1923年10月5日选举他为大总统,10月10日又草草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次议会于1924年11月随着曹锟的退位而结束。这时期的国会,除第一期国会外,民主代议制的职能已严重蜕化。造成蜕化的外部力量就是军阀的干预,军阀或以武力胁迫,或以金钱收买,终使国会失去独立性质;造成这种蜕化的内部原因就是,从国会第二期常会起,国会内的政党就变党为派,继而又变派为朋,这些政客派系分别以军阀总统或总理为靠山,将军阀矛盾、府院之争引入国会,致使国会内部开会时无日不争。这样的国会,所能做的只能是两件事:依从军阀意志制定宪法、法令;依从军阀意志选总统。这样的国会,在性质上已完全蜕化,它们成为军阀装点门面的装饰品和手中的工具。立法机关的蜕化,致使三权归一,行政权力恶性膨胀,形成军阀独裁的政治局面。立法机关的蜕化也告诉人们,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环境中的议会民主制度,是无法在中国军阀专制的封建土壤中成长的。

其次是宪法的更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使自己的政权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必须制定宪法,于是,军阀们无不借修订宪法为自己装点门面。这一时期,先后有两次“修宪”。1918年8月12日,由安福系一手操纵的国会成立后,即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年完成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部草案也采用了资产阶级宪法的一般内容,如确立了人民的有关权利和义务,规定采取两院制、内阁制等。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如规定“大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取消了大总统解散国会的一切限制;还扩大国务员成员,除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得为国务员外,大总统还可以任命其他人为国务员。1923年,国会第三期常会开会,除接受曹锟的贿赂选举其为总统外,还草草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确立国家政体为责任内阁制,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增加了“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列举了中央与各省的所属权限。属于中央的是:外交,国防,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监狱制度,度量衡,币制及国立银行,关税,盐税,邮政,电报,航空等;属于各省的权力为:省教育、实业、交通、市政、水利、省税、银行等,其中还规定各省可依据宪法制定省自治法律,这些反映了联邦制的倾向。这部宪法由受贿之议员所组之国会制定,故而立即遭到全国的反对,没有发生实际效力。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中共和、总统、内阁都保住了,但仅仅是纸上的东西。

再次是内阁的演化。如前所述,根据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真正的内阁制度建立的基础有两条,即健全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民国以来,建立了旨在制约大总统权力的内阁,但在军阀强权的控制和干预下,内阁失去了正常运作的机制。这一时期一共出现了30届内阁(包括临时内阁),这些内阁有如下特点:第一,内阁为军阀所左右。第二,内阁地位以实力为转移。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中,内阁作为行政中枢,常与总统、国会形成权力制衡与协调关系,按内阁制常规,多是元首虚位,总理领导内阁,担负实际政治责任。但在北洋时期,军阀们根本不讲法制,只讲实力,只讲有位即有权的原则,使内阁实际上为强权所左右。段祺瑞迫于形势和压力,于1925年12月改组政府,增设国务总理和国务院,国务会议由国务总理主持。这一改组,虽然表面上国家体制回到了内阁制,但段祺瑞仍掌握全权。段祺瑞的揽权与独裁,导致军阀派系矛盾又起。直、奉军阀打出“尊法”旗号,提出“组织合法政府”,段祺瑞得不到直奉军阀的支持,只得于1926年4月20日退出北京。段祺瑞离京后,北京政权初期仍保持着临时政府的面貌,元首空位、总理摄政。1926年12月,张作霖借15省“推戴”之名义,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军政府,张任“陆海军大元帅”。在这个军政府中,国务院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由大元帅任免,各部总长“承大元帅之命掌握本部事务”,大元帅直接操纵行政部门。此外军政府没有任何所谓代议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形式,大元帅不对任何机关负责。北京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是一种极端的军事独裁制度。

在外交上,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北洋政府进一步失去对西北边远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企图脱离中国,分别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和俄国,而不是北京。

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秘密地向袁世凯提出五号,共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五号要求通过派遣顾问的方式来控制中国政府,特别是控制警察、武器购置、兵工厂以及福建省的发展。5月7日,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前四号各条的大部分要求。尽管英国公使认为“日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比德国对比利时采取的行动更为恶

劣”，但是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没有出来帮助袁世凯。1915年5月25日签订的中日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南满、内蒙古东部等这些很早就被强占为其势力范围的地区的统治地位。

此外，列强势力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扩张与外国对中国国内税收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同步进行。继任赫德职务的英籍总税务司趁武昌起义之后国内动荡之际，于1911年11月经英帝国政府的同意对海关的税收工作作了根本的改变，此时这笔税收完全用作中国向外国借款和所欠赔款的抵押。以往，外籍税务司向北京呈报其税收账目，而由管辖海关的中国官员实收税金。而此时，由于大部分省宣布独立，海关与中国所欠外债的抵押关系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维持：外籍税务司首次收取税金，并将税金通过总税务司转给设在上海代表债权人的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当各国领事团于1911年下半年将会审公廨置于其共同控制之下时，外国势力在上海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自由主义的政治追求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对分析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对其命运的分析可以解释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诸多现象。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中国正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压迫，一批活跃于中国政界、学术界的人士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其中两个重要代表。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由于缺乏充分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受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后期又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终以失败告终。

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是造成两种文化冲突的原因。具体表现在：第一，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差异与冲突。自由主义一般将社会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抽取掉个人，就没有社会；因而，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群体价值，注重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强调自治和自己的责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认为个人是社会、群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以社会为本位，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注重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第二，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差异与冲突。自由主义更为强调功利价值，认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与否是衡量善恶的根本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人民主权观念与君权神授观念的差异与冲突。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以社会契约论为基本方法，以权力来源于人民为基本前提，这也构成了民主文化和民主制度的理论前提；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调君权神授，权力来源于上天，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这构成了民本文化与集权制度的基础。第四，公民理念与臣民理念的差异与冲突。自由主义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强调人的独立、自由，体现出公民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伦理秩序政治化，强调“家国同构”，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出的是臣民理念。第五，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自由主义强调自治与契约自由，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民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任何事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权力的地位至高无上，皇帝的决定高于一切，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

上述差异使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很难扎根。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道德集权思想之间存在鸿沟。因而，当两种思想在时空上交汇时，

必然产生冲突与碰撞。这种冲突与碰撞,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95—1898年,表现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顽固派、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发了一场拯救、改革和发展中国的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主要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于过于强调皇权而忽视臣民权利的封建专制主义,而孔孟之徒是这种专制的捍卫者与倡导者。改良派的思想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坚决反对。顽固派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文化,包括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而洋务派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非政治思想。

第二次大冲突发生于20世纪初期。表现为以孙中山、邹容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斗争。当时,清政府沦为西方列强的傀儡,中国人民深受外国列强、清政府的统治和剥削,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推翻清政府的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派以洛克的“自然权利”和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为基础,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暴君和卖国贼,他们以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论为基础,篡夺人民的权利,建立专制政府为自己服务。因而,应当用自由民主思想代替儒家学说,通过革命,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清政府,还权于民。他们发动革命,并取得了暂时成功,于1912年建立了共和国。

第三次大冲突发生于1919年及以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中国民主党派人士坚持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受到来自传统学者、官僚和军阀的批判。这一时期,以胡适、戴季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试图在中国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民主既是人类生活方式,也是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急需民主。相应的,有一批封建文人、官僚和军阀坚决批判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他们批评这些学说“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颂扬孔孟之道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神圣的学说。这次论争中,由于社会主义学说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批判,自由主义未能成为主流。^①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由诸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列强的入侵造成的中西文化冲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中国发展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深层根源则在于市场的发育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国民党全国执政的开始,作为其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孙中山曾不断对三民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使其具有西方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苏联列宁主义三大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表征,从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的西山会议派、戴季陶、第三党、改组派及理论家胡汉民等都对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重新定位。

以国民党元老邹鲁、谢持、居正、林森为首结成的西山会议派,在理论上强调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张复兴“王道之文化”。在他们看来,民族间的竞争是不争的事

^① 此节参见李志勇《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6页。

实,弱小民族永无振兴之日;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优秀,目前却几被遗忘;他们攻击中共“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力主取消联共政策、“变更”联俄政策,否认阶级斗争学说的价值,指责中共“成为外国支配中国的工具”。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掀起的“变更”孙中山三民主义实质的汹涌浪潮,成为国民党实施“清共”的理论基础。

为树立蒋介石高举孙中山大旗、承继国民党道统的形象,蒋介石和三民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改造。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先后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著作。他认为:三民主义是正宗的儒家思想,没有丝毫的西方思想来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他又指出:三民主义并不是保守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西方最新的科学,因而它具备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先进性。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带有很明显的中体西用特点。^①

1927年后,国民党实际上是将戴季陶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戴季陶认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迫切需要强大的自信心,而孙中山先生创造三民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心”。恢复民族自信心,必须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以民族为本位,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之间具有不解之缘。在戴季陶看来,孙中山具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是高于所有现代思潮之上的学说。民族主义是实行民权主义的基础,民权主义是为了解决民生主义的前提条件,所以,三民主义的本位实际上就是民生主义。1925年之后,戴季陶的主要工作是对民生主义的系统化。他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论证,生存欲望是人类欲望的基础,满足了生存的欲望后才可能谈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人是群生的动物,所以团体组织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它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和社会发展,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服从国民党一党专政。

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解释,目的是为了论证孙中山思想的传统特征和国民党作为领袖党的合法地位,他的儒家化三民主义及民生史观,颇得蒋介石欣赏,也为蒋介石的“伦理建设”思想打开了思路。蒋介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徒自居,常常在各种场合讲授三民主义。他把三民主义具体归纳为心理、伦理、社会、政治和经济“五大建设”,这一提法源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伦理建设则是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新补充。蒋介石认为,孙中山强调的“知难行易”由孔子始,至王阳明而复兴,在孙中山则为集大成。孙中山认为,“知”较难,而“行”较易,蒋则由此阐发出他自己的独特的“力行哲学”。蒋认为,“行”包括思维与言行,是唯一的人生哲学。“行”借助于“诚”而得以发展,“诚”则由“仁、义、礼、智、信”构成。这种伦理建设应用于社会与政治上,要求每个公民遵守由“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组成的“四维”和“八德”,不问理论,不用思维,忠诚领袖,盲目“力行”,甚至于“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主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伦理建设的目的依然是“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进而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服务。为此,蒋介石于1934年在南昌首倡“新生活运动”,明言“其目的在求中国国

^① 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民的‘现代化’”。但在许多场合,他却要求民众做到“生活军事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显然,蒋介石对于三民主义的伦理建设的补充,具有较浓重的政治目的。

四、科学社会主义异军突起

1919年5月4日,以北京青年学生为先锋,有各界民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政治运动,似狂飙一般迅猛席卷整个中国。千百万人从狭小的天地和宁静的生活中猛然醒过来,聚集起来,壮怀激烈,热血沸腾,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奔走呼号。

一位当时的外国外交官写道:北京学生掀起了大事。千百年来,有组织的舆论第一次在中国发动了。在山东问题决定前后,由于学生的游行示威在先,商人同情继起于后,中国自觉了。吴玉章在谈到那时的情形时亦说: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五四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平民征服政府”,即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和约上签字,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促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新的理论。由于中国的主权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强出卖,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失去了往昔的崇高,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成为新的营养来源。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半个世纪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理论就开始在中国出现。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1899年2月至4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发行的中文报纸《万国公报》上曾两次出现的马克思的名字,应属最早。而中国人的著述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梁启超,梁氏在1902年至1904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三篇文章中对此都有涉及。其中《中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即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1903年2月,革命派人士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不仅提到了马克思,而且还提到了阶级斗争学说和《共产党宣言》。1905年朱执信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和《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两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作了较多的介绍,并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1911年,江亢虎及其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也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进入民国以后,1912年10月,孙中山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等演说中对马克思及《资本论》大加推崇。

以上成分复杂的各派政治人物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一鳞半爪的介绍,还不应视为中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认同甚至是吸纳,有些论说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但它们至少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学说的一定程度的关注。同时,也说明仅仅依靠当时中国的内部条件,还不能使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为国人所追求和接受。

尽管在五四运动以后,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一道醒目的风景线,但是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和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